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
第76期（民國101年6月），143-151
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

高晞，《德貞傳：一個英國傳教士與晚清醫學近代化》
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9。528頁。

張哲嘉*

在全球框架下各國醫學如何走向近代化？這是一個歷久彌新的重要課題，但是每個地方的研究進程不一。日本由於在江戶時代杉田玄白(1733-1817)等人所翻譯的西洋解剖學，提早啓動了西化的契機，連帶造就明治以後在東亞的領先地位，因而學界對此振興國運的醫學近代化問題興趣濃厚，研究成果也特別豐碩。中國方面相對顯得單薄，概論或單篇論文的數量雖然不少，但系統性的專書論著卻有待急起直追。2009 年復旦大學高晞教授所著的《德貞傳：一個英國傳教士與晚清醫學近代化》一書出版，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個空缺。由於醫學傳教士是早期介紹西學入華的先鋒，又跟民眾有密切接觸，這本書就透過這樣一位人物的眼光，生動地呈現了晚清醫療與衛生的種種世相；同時也藉由他活躍的身影，觸及了當時中國社會與西方醫學接觸的各個層面。此書不依傍理論立言，材料豐富，文字活潑，不管是對瞭解晚清醫療社會史或是中國醫療近代化的歷程，都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。

高晞從事醫學史教研多年，是少數歷史科班出身而能潛習醫學專門知識的優秀學者；她的老師朱維錚在序裡就透露，爲了體驗西洋醫學的實務，她曾參與醫學本科生的人體解剖實習。數年前她獲選爲哈佛燕京學社青年訪問學員，更進一步掌握外國史料。其實高晞從事中外醫學交流史多年，1993 年就曾與兩位學者合著《中外醫學文化交流史——中外醫學跨文化傳通》，因此她挑選

*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

醫學傳教士德貞(John Dudgeon, 1837-1901)立傳，寫來十分得心應手。

德貞出身蘇格蘭，是聯合長老教會(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)的教友。他曾經學習醫學、神學與文學，於格拉斯哥大學(University of Glasgow)取得醫學博士學位(M.D.)。畢業後立志從事海外醫療傳教，由倫敦傳道會（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，本書稱之爲「倫敦會」）於 1863 年派往中國，先在山東芝罘開設醫館，次年被指派接替倫敦傳道會駐北京醫學傳教士雒魏林(William Lockhart, 1811-1896)的遺缺，從此常駐北京。他除了從事醫療傳教外，也被總稅務司赫德(Robert Hart, 1835-1911)延聘擔任海關醫官，負責船舶檢疫、監控各地衛生狀況，並提供僑民醫護服務。此外，德貞於 1872 年獲聘爲同文館醫學和生理學教習，執教長達 23 年，亦常在報刊發表文章，介紹西方醫學新知。

德貞的醫術在北京顯然贏得不少病人的信賴，除了由他所草創的醫院外，還額外擴張兩處診所。他自稱曾經送種痘疫苗入宮，而他也的確醫好過多位高官，並且成功打入了上層社交圈。這些成績使得他的診務十分繁忙，以致於倫敦傳道會責難他疏於傳教，再加上他個性好鬥，與幾位同事發生爭執，最後於 1884 年與倫敦傳道會分道揚鑣；不再是傳教士的德貞，選擇繼續留在北京行醫與傳播西洋醫學知識，直到 1901 年逝世。

英國《泰晤士報》爲他發布的訃聞，稱他爲「北京知名的居民」；《英國醫學期刊》則描述他爲「在中國知名度僅次於赫德的外國人」。然而對絕大多數的中國近代史學者來說，他比赫德渺小得多。只有兩種學者對德貞並不陌生：一是借助英文來了解近代中國醫學的讀者，因爲德貞勤於觀察、研究，並且經常向英國報導中國衛生狀況，他們所看到最早的調查報告常是德貞的作品。另一種則是關心西學在華傳播史的中文讀者。由於德貞是少數能用中文撰述科學知識的洋作家，著作亦豐，即使沒有看過其文章內容，也常會在刊物目錄上見過這個名字。同樣是翻譯西學的先驅者合信(Benjamin Hobson, 1816-1873)，需要中國人協助，才能翻譯艱澀的醫學名詞，德貞卻不假手他人，可見其駕馭漢語能力極強。根據書末附錄統計，他以中文出版的文章多達 50

篇，發表園地包括《萬國公報》、《中西見聞錄》、《教會新報》以及《昌言報》等重要報章刊物；他的英文文章至少有 43 篇，還不包括他對讀者投書的回應與醫院報告。1886 年，德貞編譯《格氏解剖學》(Henry Gray, *Gray's Anatomy*, 1858)，書名定爲《全體通考》，這是一部二函 12 冊、長達 45 萬字的巨著，並無史料指出有任何中國人協助德貞翻譯。除了醫學之外，德貞興趣廣泛，他喜歡攝影，也有介紹攝影的著述；他研究過康熙以後俄國東正教在北京的活動史，所寫論文得到沙皇褒獎；此外，他倡議中英同盟，也對中國鐵路問題提出不少獨特的建言，顯示其精力充沛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李尙仁曾經寫過〈健康的道德經濟：德貞論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和衛生〉一文，介紹他的衛生理論與理想社會觀，說他縱然算不上「偉大的醫師」，但畢竟還是個「看來不重要但又不尋常的人」。無論如何，德貞活得精彩，富有觀察力與活動力，活動範圍廣，對很多事物都能留下獨到的歷史證言，從這麼有趣的人身上，高晞想要訴說甚麼故事呢？

此書分上下兩篇。上篇（第一至四章）又分兩部份，前半依時序述說德貞個人在英的家庭背景、求學成長過程，以及來到中國後從事醫學傳教的經過，作者稱爲「德貞前傳」。後半則講述他後半生脫離教會，專心從事醫療、醫學著述，以及反對鴉片等活動，所採策略不同於前半，著重於描述德貞在北京的兩大交遊圈：一是掌握《萬國公報》等中文媒體的西洋傳教士，另一是中國上層階級的士大夫。這樣的寫作方法，多少破壞了德貞一生時序的連貫性，但或許需要這樣特殊處理，才容易將德貞晚年所從事的活動理出頭緒。無論如何，兩大交遊圈的前者通常扮演晚清傳播西學的尖兵，後者則是中國最早體驗並且崇信西洋醫學的菁英分子，德貞周旋於兩者之間，使得清末中西文化接觸下，當時知識人的交際生活躍然紙上。

下篇以幾個不同的醫學史專題爲主，表彰德貞在醫學不同領域對中國醫學近代化的貢獻。相對於傳記色彩較強的上篇，這個部份更像是論文集，共分五章（第五至九章），就建立醫院、醫學教育、解剖學、公共衛生與疾病調查，

以及德貞的反鴉片活動等課題分別申論，值得多加評說。

第五章〈醫院醫學：近代醫學的誕生〉，主要講述德貞在北京開設醫院的經過及其診療的情形，文字可讀性極高，內容也饒富趣味。德貞本人有詳細記錄的習慣，作者據以增添了不少鮮活的細節，譬如選擇場地的考慮、醫院的出入帳目、還有求診病症的比例變化，乃至於施藥的情形等，對全方位了解十九世紀末英國式西醫的治療思想與行爲，極具參考性。特別是，德貞仍然相信西方古代所流傳下來的體液學說，用藥也不乏大黃、沒藥等天然藥物，但同時他也努力把最新的西醫知識翻譯成中文。所以德貞其實是個西洋醫學轉型間的過渡性人物，以他作爲一個案例，也見證了傳入中國的西醫，本身也是處於不斷演化的過程之中。

第六章〈晚清官方新醫學教育〉，主要談的是德貞在同文館中擔任教習 23 年(1872-1895)的歷程。由於其所隸屬的總理衙門中有大臣不信西醫，因此醫學並未列入正式課程，僅以非必修方式講習，俾使學生增廣見聞；此外，同文館也不允許學生赴醫院實習。德貞勤於中文撰述，醫學課程的中文教材多出自其手，教材則跟上時代，介紹當時西方最先進的生理學知識。德貞主要講授解剖學與生理學，也教些簡易的用藥以及急救法。高晞特別推崇德貞翻譯哈維《心血運動論》(William Harvey, *De Motu Cordis*, 1628)原典的貢獻。德貞對哈維與中醫的說法，詳列異同，娓娓說明，雖然不相信中醫，但也不加以譏笑謾罵。特別有趣的是，德貞晚年竟然改變立場，轉而相信中醫確能憑把脈來判斷是否懷孕，認爲這點「西醫卻無華醫之神妙！」德貞這個一百八十度大翻案的背後，應該意味著其個人思想或人生觀的重大轉變，可惜高晞並未就此加以深究。

第七章〈《全體通考》：身體知識的現代解讀〉，主要是談德貞翻譯西方解剖學經典《格氏解剖學》的來龍去脈。這個問題一方面牽涉到對解剖學內涵的理解，同時也必須顧及如何從中文選擇辭彙來翻譯。1774 年，正值日本江戶中期，杉田玄白翻譯《解體新書》(Johann Adam Kulmus, *Ontleedkundige*

Tafeln, 1734)，啓動社會大眾對西洋知識的興趣，並促使日本提早推動近代化，所以日本的醫學辭彙翻譯已有很成熟的研究，本章可與既有研究對話。近年來，關於近代中國與日本創造新語彙以吸納西方新知識的研究，方興未艾，其第二節即爲完整的語彙考古。日本最初以「解體」一詞來對應今日所說的「解剖學」，而以「解剖」來指實際操刀觀察人體的行爲。到明治時期才大量使用「解剖學」一詞來取代「解體」，已大致定論。至於何以有此變化，作者主張，是維新後的新型知識分子藉此與翻譯《解體新書》所代表的「蘭學」傳統以及漢醫正式告別，表示從此可以直接汲取西方知識（頁 347-348）。這是一個很大膽的推論，缺乏日本史料直接佐證，其實蘭學家的中堅分子，不但能直接汲取西方知識，而且早已摒棄漢醫傳統。接下來作者的注意力轉到中國，合信出版《全體新論》(1851)後數十年，他爲英文 Anatomy 所選擇的譯詞「全體學」，已然成爲最通行的譯詞，即便德貞認爲「解剖學」較佳，他仍沿襲當時的慣例，來爲《全體通考》命名。德貞之所以欣賞「解剖學」，是不是受到日本的影響呢？作者考證後，主張德貞雖曾參考過日文著作，但對日本譯詞多不滿意，所以「解剖學」一詞應該是他自行從中醫古籍內揀選出來的。後來到了 1927 年，當科學名詞審查委員會一度爲「全體」抑「解剖學」兩個譯名相持不下時，湯爾和(1878-1940)以《全體通考》亦用「解剖學」爲理由決疑。作者認爲此例說明《全體通考》在醫學界具有不容置疑的權威性。然而，《全體通考》所用諸多譯名，畢竟未被委員會選爲中文標準，可見其份量與權威尚有一段距離。

本章另外一個有趣而且重要的問題是有關「胰」這個譯名的選定。原本中醫不知道胰臟的存在，所以最早翻譯西洋解剖學名詞時，如何處理就成了頭痛問題。杉田玄白翻譯《解體新書》時已經苦惱不已。荷蘭文的 Alvleesklier 的字根包括「肉」與「腺體」兩個意涵，杉田則是把胰臟看成人體內極大的腺體，所以先將中醫沒有辭彙可資理解的腺體音譯爲「機里爾」（荷蘭文爲 Klier），再加上「大」字來標識，惟仍覺不妥，故諄囑弟子日後務必修訂。其學生大槻玄澤(1757-1827)於 1798 年創造「膵」字譯名，後來宇田川玄眞(1770-1835)又

改創「膵」字譯名，日文慣用的譯名才確定下來。同一時期，中國醫生王清任(1768-1831)在檢視屍骸時，發現有這個中醫未曾辨析清楚的臟器，以動物、特別是豬胰臟的俗名稱之，另外取名「總提」。合信不知此事，所以在《全體新論》中以英語俗稱胰臟的「甜肉」翻譯，從此中國通用「甜肉」一詞指稱胰臟。德貞對中醫文獻較為熟悉，注意過王清任的獨特思想及觀察能力，並曾以英文引介給西洋讀者。因此他特意選擇了王清任所提到過的「胰」來改譯舊詞。後來科學名詞審查委員會遂不用已經在中國有一定影響力的「膵」字，而依德貞所用「胰」字，成為中文解剖學名詞不用日譯的少數特例。作者把翻譯成胰臟的來龍去脈講得完整清楚，可圈可點，可惜的是畫蛇添足，兩度強調日本醫學界認為中文較佳，遂放棄自製的「膵」字，實則不然。今日「胰」字不見於日本內閣頒布的「常用漢字表」之中，包括專業性極強的《南山堂醫學大辭典》在內，各種辭典均仍然使用「膵」字。

第八章〈公共衛生學研究與流行病調查〉，所探討的也是許多醫史家所共同關心的課題。第一節主要是介紹德貞在幫助海關醫務時，對於中國的風土與疾病之觀察，以及中西醫對於同一種疫疾的治療法。第二節的主題與李尚仁的論文相同，談到德貞對於北京生活方式的傾心，一反絕大多數來華洋人的看法，力主北京是一座健康的城市。第三節則是談到德貞觀察中國的天花疫情，並在中國推廣種牛痘；同時他也用英文，向西方的讀者介紹中國對抗天花的方式。他的第一手觀察報告，後來為中國公共衛生的創始人伍連德(1879-1960)所大量引用。

第九章〈鍥而不捨的反鴉片鬥士〉，則主要描寫德貞以堅決反對毒品為志業，為了禁煙，他總是站在第一線，而且永遠抱持最嚴格的標準。他深悉鴉片禍害之深重，為此甚至公開痛斥販賣鴉片的祖國是十惡不赦的罪犯。他甚至向全國基督教大會提案，希望能支持所謂的「德貞計畫」，利用各種管道向中、英統治階層呼籲禁煙。儘管他的提案遭到否決，但是他的努力應該為中國史家所重視。作者的描述填補了歷史空缺，有益學界；而透過他對禁煙活動的描寫，

德貞堅韌、頑強、性格激越等個人特色，更加鮮明。對於整本人物傳記來說，有畫龍點睛的效果。

熟悉台灣醫史動態的讀者，可能好奇：高晞與李尚仁兩人描繪的德貞，究竟有何異同？李文先出版，也出現在本書的徵引書目，但是作者對於李尚仁的見解，似乎採取既不否定、也不接受的態度。就兩者同樣處理的北京衛生與生活方式問題，李尚仁的觀點是德貞有前後變化，他在 1870 年代是貶多於褒，但到了 1884 年卻看法迥異，改稱中國人深諳養生之道，應該成爲英國仿效的對象。高晞筆下的德貞，則是一貫欣賞北京爲健康的城市。李尚仁認爲，德貞有自己特定的英國社經位置，階級性明確，立場偏向富裕階層；他信奉家父長專制，對於某些湧入城市的弱勢外來族裔——如愛爾蘭人——也有偏見，基本上屬於懷舊的保守派，因而對 1880 年代的祖國自由派當道者頗有非我族類之感，並對他們所推動的衛生運動，覺得處處不順眼。李文認爲德貞的醫學理論不符合主流看法，可能正是因爲他與主流格格不入，後來才會對中國的衛生、乃至於中醫脈學改變看法。他後半生擁抱中國，固然部份出自他對這塊土地的喜愛，也可能是因爲他已經對故鄉失望，選擇終老異域。如此看來，他是個對祖國抱有強烈複雜情感的英國人。

相對而言，高晞所描繪的德貞則純然無私奉獻、比中國人還關心中國，所作所爲都是以中國福祉爲出發點。他到中國之後，原本擁有的英國特質與社經脈絡大多隱而不顯，雖然讀者不會忘記他畢竟是個英國人，但這個事實主要用以襯托他仗義譴責祖國販毒的凜然氣節。這裡的他對祖國也有強烈情感反應，只不過其背後動機僅單純出於義憤。德貞的英國同胞懷疑他力倡消滅鴉片，與他私人販售「禁煙丸」的商機有關，關於這一點，高晞選擇低調處理。其實書中也提過德貞確有生意頭腦，李尚仁指出，有史料揭露德貞曾假借人頭開設錢莊牟利；至於他曾經投稿自炫有術，贏得北京上流社交圈顧客的歡心，亦確有文獻可考，這種結交心態與眞誠友誼之間，不免有所差距。

高晞或許受其老師朱維錚影響，因爲朱維錚爲本書作序說：「我們的主流

史學，多年來不是把區分『誰是我們的朋友，誰是我們的敵人』當作指導近現代史著述的第一原理麼？……德貞，從任何角度來看，都該稱作中國人的朋友吧。」（頁 3）因此本書中德貞的形象彷彿愛國劇中的英雄人物，與人性弱點絕緣，只見一派正氣。在寫作策略上，作者竭盡所能地走訪德貞後人、到世界各大圖書館蒐集德貞的著作，並將這些中英文文獻條分縷析，再將材料運用到書中不同章節。藉著第一手材料本身的張力，作者彷彿讓德貞重返人間，把自己百年前發表的主張，再次宣說給今日的讀者聽。殊不知，這種書寫方式有時會成爲雙面刃，一方面雖讓讀者更容易貼近傳主的個人世界；可是，太過仰賴傳主本人的觀點，難免放大其本來就有意揄揚的形象，同時也容易遺漏其主觀上試圖隱瞞的面向。在這一點上，作者雖然參閱過李尚仁的文章，但是既未藉此思考該文提及德貞生平的重大轉折，以及對中醫脈學改觀之間的內在思想關連，也對李尚仁所論述之德貞社經背景與個人風格等處保持緘默，彷彿這些訊息並不存在，反倒喪失了一個平衡觀點、並且進一步探索德貞人格特質的機會，就一部傳記而言，實在可惜。

順帶一提本書的格式問題：中國大陸有些學者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，引用未出版的會議論文，本書也有類似情形，應該更加強溝通，讓他們了解這是國際學界規範的禁忌。此外，本書編輯上出現一些疏漏與訛誤，讓人不免有所微詞。事實上，第一個腳註就出錯，把德貞所撰“Report of the Peking Hospital for the Year 1869”中的“Year”誤植爲“yea”（頁 4）；次頁引述英國醫學史名家 Roy Porter 的著作，又把其大名改爲“Portet”。除了英文以外，中文也有疏漏。如頁 224 中引用《北京市志稿》「告朔之餼羊」一語，書中印成「告朔之？羊」，這些失誤，出版社編輯實難辭其咎。

儘管有上述的疏失，大體而言，此書仍爲中國近代醫療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示範作用。透過爲一個英國醫學傳教士精彩的一生立傳，折射出一個時代醫療衛生的風貌，同時也可呈現出人與知識的互動。日本近代醫學的研究，以深入探究最早翻譯《解體新書》的杉田玄白的學思與交遊爲出發點，從而追索日

本蘭學學脈各家譜系的端緒，可謂水到渠成。中國採取類似手法探索相關課題的，則有皮國立關於晚清中醫學思想家唐宗海(1851-1897)的研究，而關於十九世紀起西醫傳入中國史早期的完整研究，則僅有董少新翻譯的《伯駕與中國的開放》。高晞當然知道合信翻譯西洋醫書更早，影響亦大，但是他選擇德貞爲研究對象，可能就是因爲德貞在北京高官、海關、同文館，乃至與各種啓蒙媒體都有人脈牽連，和英國方面亦仍互通聲氣，其生平經歷所能反映的面向豐富，較合信有過之而無不及。作者捨合信而先完成德貞的研究，是個聰明的選擇。

據悉高晞教授現在正在進行《海關醫報》的研究。正如德貞傳記一樣，這個新計畫涉及清末西洋醫學來華史的諸多課題，足可顯示她選題的智慧。期待在不久的將來，看到她再度出版內容充實、文筆暢達的新作品。